

张伯驹研究辨谬

章宏伟

我们可以说，张伯驹名列所谓“民国四公子”之说，是毫无意义的，更不用为削足适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“四公子”有哪几个更合适。

出身贵胄门第的张伯驹(1898—1982)，河南项城人，字家骥，号丛碧，别号游春主人、好好先生，是中国20世纪的“大玩家”，琴棋书画诗词戏曲样样精通，集收藏鉴赏家、书画家、京剧艺术研究家、诗人等身份于一身。一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，尤其是他从30岁开始爱好收藏，发展到嗜书画成癖，醉心于中国古代字画名迹，一掷千金，买下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等，并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，其著作《丛碧书画录》记蓄藏书画名迹117件。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名迹，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陆续捐赠，化私为公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张伯驹的捐献加上故宫博物院购置，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、李白《上阳台帖》、杜牧《赠张好好诗》等22件张伯驹收藏过的书画名迹，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收藏(故宫博物院编《捐献大家张伯驹》与故宫博物院、项城市政协编《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捐献作品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集》，均只收录了20件书画，还有宋赵孟坚《行书自书诗》卷与元俞和临赵孟頫书《常清静经》轴2件都没有收录)。

随着近年来收藏热的勃然而兴，作为“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”的张伯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，张伯驹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关注，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但现在的研究论说，颇有演绎的成分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势必以非为是，混淆历史真相，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张伯驹的本来面目。

“近代四公子”还是“民国四公子”？

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，一开篇总是说：张伯驹“早岁名列‘民国四公子’”。一些工具书，如《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》《中国艺术家辞典·现代第三分册》《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》《吉林省百科全书·下册》《中国文学家辞典·现代第二分册》《历代藏书家辞

典》都说张伯驹与张学良、袁寒云、溥侗并称四公子。

乍一听：出身豪门，多才多艺，潇洒风流，具传奇色彩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学界对于“民国四公子”之说，没有提出异议，都认可：上个世纪20年代初，“民国四公子”之说在南方出现，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。“在民国上层社会中，素有四公子之说。这些公子皆出身名门，或为军阀政要之子，或为商界名流之后，或为清朝皇族宗室。但究竟所指何人，却说法各异，而这些公子们的事业发展、兴趣爱好与个人命运，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。”(张晨怡《教科书里没有的民国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33页)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对“民国四公子”都有谁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，归纳出至少有四种说法(马勇《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》，《新江淮文史》2013年第2期)：一指陈锦堂、袁克让、张伯驹、宋传兴组合；二指袁克文、溥侗、张伯驹、张学良组合；三指袁克文、卢小嘉、张伯驹、张学良组合；四指孙科、张学良、段宏业、卢小嘉组合。马勇认为，“不过要说民国时代，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，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》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，大致有袁克文、张伯驹、张学良、卢小嘉、张孝若、溥侗等六人备选。如果继续筛选，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、张伯驹、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，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：能以富贵下贫贱，贤能拙于不肖，有担当有肩膀，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，风流倜傥，雅而不俗，敢做敢为，敢爱敢恨，乐善好施，风流而不下流，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忱。”

王忠和甚至专门编著《民国四公子》一书(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)，该书《写在前面》说：“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、袁世凯之子袁克文、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、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，均为民国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



张伯驹演出《四郎探母》剧照，左为余叔岩，右为张伯驹



张伯驹、潘素及外孙楼开肇合影

豪们子弟，人称‘四大公子’或‘民国四公子’。”“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亦有他本，袁克文、张伯驹、张学良三人各本皆榜上有名，卢永祥之子小嘉、张謇之子孝若、张之洞之子张权亦曾列于其中。本书所取是依民国年间社会最为通行之说法。‘民国四公子’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……”

我这里征引的张晨怡、马勇、王忠和三位的论说只是例举而已，还有不少书籍文章都持类似说法，可知“民国四公子”说的影响之大。大家都把“民国四公子”当成了客观事实，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否真的存在过“民国四公子”，如果真有“民国四公子”之说，又是由何人在何时、何地先说出来，或先用文字记下来，在报刊书籍上刊登出来的？之后都有哪些书报在继续散布？大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，“‘民国四公子’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”，但没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们这提法出自何处。

好在近十几年来数据库建

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民国期刊库、申报库等海量数据为我们搜检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但直到笔者写本文的时候，我没有查到民国时期关于“民国四公子”的消息。笔者所见最早关于“民国四公子”的文字出自张伯驹手笔，他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在中央文史研究所著的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》中说：“人谓近代四公子，一为寒云(按：袁克文)，二为余，三为张学良，四、一为卢永祥之子小嘉，一为张謇之子孝若。又有谓：一为红豆馆主溥侗，二为寒云，三为余，四为张学良。此说盛传于上海，后传至北京。前十年余居海甸，人亦指余曰：此四公子之一也。”之后，张伯驹在《也算“奇缘”——我与陈毅元帅》中又提及：“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，宣传部所属文教部门统被冲击，我的帽子为封建余孽、反动学术权威、四公子之一、康生点名的大右派、陈大炮(造反派称陈毅元帅为陈大炮)的死党，尤以因写《春游琐谈》笔记，称为春游社反党集

团，全国皆有组织。”

或许当时确实有“四公子”的说法，但绝不是所谓的“民国四公子”，因为张伯驹自言“人谓近代四公子”，此言“近代”而非“民国”，这不只是两字之差，意义非比寻常。

先来看“四公子”说法产生的时间。学界的认定和张伯驹的自言，显然有着巨大的时间差。

学界认定“‘民国四公子’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”，固然是为了避开袁克文1931年死于天津，但我们也要分析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无可能形成这种说法。

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阁楼，其生父是张家老六张锦芳。张家老五张镇芳是张家唯一考中进士做官之人，遗憾的是两个子女先后夭折。1905年，7岁的张伯驹被过继给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，来到天津。张伯驹自述：“八岁至十四岁住天津，在家中私塾上学，十四岁曾入法政学堂，肄业，十五岁随父去河南开封，十七岁在北京，十八岁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肄业，二十岁毕业，二十一岁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，后改任长江巡阅使署咨议(在蚌埠)。后安徽督军倪嗣冲病故，二十三岁去职，二十四岁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谋，四省经略使署咨议(皆名誉职)，二十六岁任陕西省军署参议(在西安)，二十八岁去职，二十九至三十七岁任盐业银行经理(在上海、南京)……”(张伯驹潘素文献整理编辑委员会编《回忆张伯驹》，《张伯驹自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197—198页)可以说，直到1927年，张伯驹的生活不说波澜不惊，也是乏善可陈，总之很平淡。张伯驹30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，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自己钟爱的传统艺术上，他自述：“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，三十岁开始学诗词，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，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。”当然，也从这时开始，张伯驹徜徉花街柳巷，得识潘妃(后改名素)，惊为天人，才有了后面的美满姻缘。这些都基于张伯驹子继父业，任职盐业银行，有经济后盾、有职

(下转10版) ➤